

广州与海洋文明

季羨林署

蔡鸿生 主编



中山大学出版社

广州与海洋文明

季羨林署

蔡鸿生 主编



中山大学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广州与海洋文明/蔡鸿生主编—广州：中山大学出版社，
1997. 11

ISBN7-306-01400-5

I. 广… II. 蔡… III. ①地方史：文化史—广州 ②对
外经济关系：中外关系—经济史—广州 IV. K296. 5

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)

广州景泉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787 毫米×1092 毫米 32 开 12 印张 288 千字

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1000 册 定价：25.00 元

目 录

- 序 蔡鸿生 (1)
- 唐宋时代大食蕃客礼俗考略 甘正猛 (5)
- 宋代广州的蕃姓海商 陈学军 (49)
- 市舶太监李凤事迹考述 王 川 (127)
- ✓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输入西洋火器的经过和影响
..... 王 熙 (183)
- “北皮南运”与广州口岸 周 湘 (224)
- 明清时代荷兰与广州口岸的贸易和交往 章文钦 (284)
- 清代广州的荷兰馆 蔡鸿生 (338)
- 鸦片战争前后广州口岸的巴斯商人 郭德焱 (356)

序

蔡鸿生

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城市中，广州的历史地位是十分独特的。比较来说，有些古代贸易港虽然曾经煊赫一时，到近代就一蹶不振了；反之，若干近代崛起的名城，则在古代历史上默默无闻。只有南海之滨的广州，自汉、唐、明、清延续到现代，上下两千年，历久不衰。这个现象，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，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。

作为一个著名的通商口岸，广州是唐代“通海夷道”的起点，其市舶之利被誉为“天子南库”，与封建时代的国计民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。世界航路开通之后，广州在东西方交往中的地位，更加蒸蒸日上。尤其从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清廷专限广州一口通商至咸丰六年（1856）“亚罗”船事件，在这跨越18、19世纪的整整百年中，广州完成了从古代贸易港向近代通商口岸的转变，季节性的“互市”被形形色色的“夷务”所代替。洋行、教会、买办、西医院、新闻纸，等等，以双管齐下之势，使西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广州汇聚，并向内地扩散，成了中华大地得风气之先的“南风窗”。乾嘉年间的扬州方言，曾流行过所谓“想发广东财”的民谚，说明江南的社会心理已经打上岭南经济现实的烙印。至于广州口岸的辐射能

力及其对吏治、士习和民风的影响，就不在这里细说了。

从学术史来看，广东学者对广州口岸的研究，起步是很早的。清初的屈大均，不仅在《广东新语》中记述了洋舶和洋货，还在诗歌创作中发出忧国忧民的感慨：“洋舶通时多富室，岭门开后少坚城。”到了道光年间，海警初开，梁廷枏就网罗当时的中外资料，写成《粤道贡国说》、《粤海关志》和《夷氛闻记》等海防书籍，为这个研究领域提供了一批奠基性的著作。前辈学者筚路蓝缕开创的传统，是十分可贵的。在开放、改革的今天，尤其应当继承和发扬。

如果放眼国际学术界，也同样可以感受到加强广州口岸史研究的迫切性。早在1964年，一部四卷本的研究广州口岸的专著《中国与西方——十八世纪的广州商务》，已在巴黎出版。最近20年，仅仅关于费城人在广州的贸易活动，美国就出版了几种专著。1984年，为纪念美国商船首航广州200周年，又有《中国皇后号》一书问世。荷兰学者1982年在海牙出版的《瓷器与荷兰对华贸易》，详细记述了乾隆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商业机构和商业活动。加拿大1973年出版的一部《海运毛皮商船志》，逐年著录了从美洲西北岸贩运皮货来广州的商船名称、船长、吨位、停泊和返航日期，对研究1785~1825年的广州口岸，有特别重要的资料价值。18世纪远销俄国的大批广州珐琅器工艺品，在1988年莫斯科出版的《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的中国珐琅藏品》一书中也有详细叙录。这些西方著作，广泛涉及海运茶、外销瓷、北皮南运，乃至十三行和粤海关的历史，是不可忽略的。此外，论述广州口岸出现的西洋事物，如1983年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的《广州博济医院与十九世纪的医学》之类的专书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
相比之下，我们关于广州口岸史的研究成果，显得十分薄

弱。门类不齐，课题陈旧，有些方面甚至成片空白。面对日益频繁的学术交流，有时就难免处于被动的地位。1985年夏季，一位年逾古稀的美国学者，在老伴陪同下专程从西雅图来访，希望了解一点18世纪广州毛皮贸易的文书或遗物，结果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。1990年1月，又有一位瑞典历史学家，为了研究乾嘉时代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，带领两名助手专程从哥德堡来广州进行学术访问和实地考察。在座谈中，客人问得很细。我们只是临时查阅历史资料，略加介绍，谈不上有什么真知灼见。

在回顾了上述几个方面的情况之后，我想提出一点加强广州口岸史研究的倡议。经费、资料和规划，本来是题中应有之义，但空谈容易落实难，暂且不必多费笔墨。我在这里只想澄清一个概念，就是口岸史不等于外贸史。从历史上看，精神舶来品与物质舶来品形影不离，几乎同步登上广州口岸。用不着追述“胡僧”与“蕃客”同舶来粤那样古老的故事，仅以清代为例，洋商与洋教，就是两大“夷务”。道光年间广州的“巴斯”，身兼港脚商人和拜火教徒两重身份，他们的墓碑至今还遗留在黄埔长洲的丛林杂草间。清代诗文常见的“西洋四镜”，既是奇器又是科技，岂不是“双料”舶来品。因此，口岸史的研究，应当是经济史和文化史的综合研究。既不能见物不见人，更不能见“器”（物质文化）不见“道”（精神文化）。可以设想，如果有人致力于广州与海洋文明的研究，持之以恒，不断地拓展史料，不断地深化论题，不断地改进方法，坐他五七年冷板凳，一定可以在历史认识上令人耳目一新。收入本文集的八篇论文，就是关于这个研究课题的尝试。其中分别探讨从中古到近代经“蕃舶”和“洋舶”传入广州的南海文明和西洋文明，点点滴滴，不成系统。编者虽有集腋之劳，而无成裘

之功。汇编是为了汇报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季羨林先生十分关心中山大学中外关系史的学科建设，为文集题写了书名。前辈寄望殷殷，后辈各宜自勉。学海无涯，我们应当努力潜研，甘于浮游的弄潮儿是没有出息的。

1997年，暮春3月

唐宋时代大食蕃客礼俗考略

甘正猛

绪 论

冯承钧先生认为，“大食”是中国载籍对阿拉伯人（Arabs）的通称；为西亚作家所说的 Tazi 或 Tay 的音译^[1]。即认为它指的是阿拉伯人（民族或国家）。可以这样说，“大食”是我国唐宋时代对阿拉伯帝国的称呼。中国载籍中最古译名为“多氏”^[2]。

大食与中国最早发生接触，从史籍记载来看，为唐永徽二年（651）遣使朝贡^[3]。

“蕃”通“番”，最早见于《周礼·秋官·大行人》：“九州之外，谓之蕃国”^[4]。这是从字面上的解释，“蕃”作为一个历史概念，其含义并非一成不变，《唐会要》明确记述了其地域范围：“东至高丽国，南至真腊国，西至波斯、吐蕃及坚昆都督府，北至契丹、突厥、靺鞨，并为人番。以外为绝域”^[5]。大食也应属于“蕃”的范畴，新、旧《唐书》均将大食列入《西域传》中；宋代文献则更明确地称大食国为“蕃”；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云：“诸番国之多宝货者，莫如大食国”^[6]；赵汝

适《诸蕃志》中关于大食的篇幅不少，无庸赘言。

关于“蕃客”，《隋书·礼仪志》云：“梁元会之礼，……群臣及诸蕃客并集，各从其班而拜”；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亦云：“凡蕃客至，鸿胪讯其山川、风土，为图奏之，副上于职方”。这些文献中，“蕃客”的含义是指“外国的宾客”，亦即官方使节。在古代的朝贡贸易中，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，商人往往冒充贡使。

唐宋时代，为大食与中国关系史上的重要阶段。大食蕃客朝贡频繁，唐代一共朝贡 26 次，宋代朝贡达 49 次，^[7]而且有为数甚多的穆斯林商人移居中土，随之而来的是他们的风俗习惯，有些被汉人吸收；同时，他们又入乡随俗，染上中国的风俗。这是唐宋时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到宋末元初，中国回族开始形成，蕃汉文化在更大程度上融合。在此之前，蕃汉文化的接触和交流，为这种融合奠定了基础。

大食蕃客的很多风俗习惯，都与航海贸易有关，其中有些不仅是航海贸易的产物，同时又反作用于航海贸易活动，因此对大食蕃客礼俗的研究，有助于认识阿拉伯人的航海贸易史甚至世界航海贸易史。

对大食蕃客的信仰（伊斯兰教）的研究，属于宗教史的专门领域，不在本文论述之列，本文只对大食蕃客的礼俗体系进行简略考察，共分八项：姓名、法律、婚姻、丧葬、饮食、服饰、好洁、祈风。

第一节 姓 名

唐宋时代大食蕃客的姓名是中世纪阿拉伯社会文化的产物；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大食蕃客的汉化。

一、蕃客的姓

(一) 关于蒲姓

“蒲”或作“浦”。南宋人岳珂云：“番禺，有海獠（指从海路来广州的阿拉伯人）杂居，其最豪者蒲姓”^[8]；在大食对宋朝的历次朝贡中，贡使多为蒲姓，^[9]日本学者桑原鹭藏、藤田丰八及德人夏德等均对蒲姓作过研究。他们认为，“蒲”是“Abu (Abou)”或“Ibn”的音译，中国人译“Abu”，多用“阿蒲”或“阿卜”字样，而略去最初之母音，仅用一“蒲”或“卜”字；又“Abu”之义为“……之父”。“Ibn”之义为“……之子”，为阿拉伯人最习惯使用的名字^[10]，但是，“蒲”究竟是“Abu”还是“Ibn”音译，并不明确。笔者认为，“蒲”为“Ibn”的音译，则更合情理，因为“Abu”与“Ibn”的意义分别为“……之父”和“……之子”，参照中亚粟特人命名的通例，似以“……之子”更为可能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从“Abu”或“Ibn”的意义看，“蒲”并非大食蕃客在本土的姓，而是其在本土名字的一部分的音译。

“蒲”虽为音译，但作为入华后的姓，仍反映大食蕃客在一定程度上打上了“汉化”的烙印，因为他们已知：“……所有在中国的人无论是中国人，阿拉伯人还是其他外国人，都必要使其家谱与某一氏族联系起来，并取该氏族的姓氏”^[11]，而“西域诸国，初无氏系，唯随其部族以为号。盖其族淳庞，其事简略，所以易行”^[12]。

(二) 唐宋时代大食蕃客改汉姓

唐宋时代，有大食蕃客改用汉姓的，如李彦昇：

“大中初年（847），大梁连帅范阳公得大食人李彦昇，荐于阙下，天子诏春司考其才，二年以进士第名显。……生于夷

域，而行合乎礼仪，是形夷而心华也”^[13]。此范阳公即当时岭南节度使卢钧。因为当时广州蕃坊中多大食人，故能得识李彦昇，李彦昇改从唐王室之姓。

应该指出，宋太祖开宝四年（971）贡使李珂末^[14]和淳化四年（993）贡使李亚勿^[15]的“李”姓，可能为阿拉伯名字“Ali”的音译，而非汉姓。

金阿里，“至正（1341～1368）间，（泉州）清真寺损坏。里人金阿里，与之（蒲寿庚之侄蒲日和）共戍厥事……”，“金”为汉姓。

海南岛原有蒲姓，后改他姓。《宋史》卷四八九“占城国”条，记宋太宗雍熙三年（986），占城人蒲逻遏率族百人，因逃国难而移居海南岛儋州。《图书集成·职方典》卷一三八〇《崖州风俗》亦记占城蒲姓因避乱而驾舟至海南岛，并入三亚里。此蒲姓为侨居占城的阿拉伯人。从其族谱看，其族中人有“哈只”之名者甚众^[16]，可知其人到过麦加朝觐者不少。自明初以来，因与黎人不和，而辗转迁居，其一部族裔改称海、哈、米、金等姓。三亚回教徒有清真寺四所，俗称东南西北四庙。东庙有乾隆十八年碑记，云：“蕃人初本姓蒲，今多改易^[17]”。

有必要对《西域浦氏定姓碑文》^[18]作些分析，以明有关史实。现将碑文节录如下：

浦君，西域阿鲁温人。……夫西域诸国，初无氏系，唯随其部族以为号，盖其族淳庞，其事简略，所以易行。若吾浦君，居中夏声名文物之区者三世，衣被乎书诗，服行乎礼仪，而氏名犹存乎旧，无乃不可乎？于是与荐绅先生谋，因其自名，而定以浦为姓，使世世子孙不敢有所改易，其深长之思可谓切矣！昔者代比群英，随北魏迁河南者，皆革以华俗，收三字四字姓名为单辞，而其他遵用夏

法。……以名为氏犹可也。……今浦君之为上符古义，下合时宜，非卓见绝识不得与于此。彼拘拘守常之士，则曰：“我先祖未之能行也，是恶足以论变通之故。”呜呼！若浦君者不亦君子之道欤？子既详论定姓之因，而并述其世系……

浦君为“土生蕃客”，其家族居中夏已历三世。从碑文可知，浦氏乃为大食蕃客入华后的姓，“以名为氏”，正如前文所述，浦为大食蕃客本土名字一部分的音译。其次，所谓“上符古义，下合时宜”，指的是浦君的姓是阿拉伯文的音译，且虽居中土三世而不改，并使下代“世世子孙不敢有所改易”，是“深长之思”，又符合“中夏亦有”以名为姓之习（碑文列举中夏皮氏、寿氏、畴氏等以名为姓的事例）。再次，浦君之先世已居中土，浦君本人“汉化”程度非浅，仍以“浦”为姓，且使子孙后代不改变，被宋濂称赞为“君子之道”，可见，在此以前（浦君为元末明初人），必有浦姓改他姓之先例。从前文看，大食蕃客改姓可以追溯到唐代（如李彦昇），元代金阿里从金姓亦是，而海南岛蒲姓，在明、清多改他姓。

（三）其他姓氏

泉州丁姓 据《福建泉州南关外陈埭丁氏执斋公图谱》所记：“吾族丁氏，肇基于始祖节斋公，由姑苏行贾入泉，居于刺桐城之文山里；递传三世，至硕德公，徙居陈江，子孙蕃衍，文物蔚起。……节斋公生于宋淳祐十一年（1251），卒于元大德二年（1298）……”。节斋公即赛曲赤瞻思丁，为“Sayyid Ajall Shamsal - Din”的音译。瞻思丁的后裔，“去夷姓，而以其末一字为姓……”^[19]。

又“瞻思丁子，纳速拉丁……子孙众多，分为纳、速、拉、丁四姓，居留各省”^[20]。纳速拉丁即“Nasiral - Din”的

音译。可见，大食蕃客入华后，有以其本土名字的译音中的任何一个字为姓的，这主要是在宋末元初以后。

二、大食蕃客名字释例

前文所述“蒲”，为大食蕃客本土名字一部分的音译。下文对蕃客名字的其他部分或不冠以“蒲”的名字，分类举例，试作考释。

（一）伊斯兰教产生以前的惯用名

苏莱曼 阿拉伯文读音为 Suleiman 或 Soleiman，为伊斯兰教产生以前，阿拉比亚人的惯用名之一^[21]，唐开元十三年（725）贡使“苏黎满”^[22]，即为同名异译。

（二）与伊斯兰教有关的名字

穆罕默德 为 Muhammad 的音译，为先知之名，“依照惯例，他是穆罕默德（声望很高的人），这个名字是一般男孩用得比其他任何名字还要多的”^[23]。宋太祖开宝四年（971）贡使李珂末^[24]和太平兴国二年（977）贡使摩诃末^[25]，以及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贡使蒲麻勿^[26]，为同名异译。还有回历 659 年（1260，南宋景定元年）死于泉州的麦哈默德·伊本·阿里伊本·欧斯曼^[27]。

阿里 即 Ali 的音译，为伊斯兰教派的什叶派习用名字。如宋绍兴元年（1131）贡使蒲亚里^[28]，元至正九年（1349）捐资修建泉州清真寺的金阿里^[29]。

易卜拉欣 即 Ibrahim 的音译，古“圣人”名，即亚伯拉罕，本是《旧约》中的人物，伊斯兰教产生后，成为《古兰经》中的人物。用此名的蕃客，如回历 710 年（1310，元至大三年）死于泉州的伊伯拉西^[30]，即为同名异译。

哈只 hajj 的音译，意为“朝觐”。朝觐是伊斯兰教的

第五项宗教义务。每个伊斯兰教徒，不论男女，在健康状况和经济条件可能的情况下，必须在指定时间内，集体访问圣地麦加一次，这叫做大朝。凡完成这种访问的人，其名便可冠以“哈只”。如泉州死于回历 676 年（1277，南宋景炎二年）的曼苏尔·本·哈只·葛斯姆·贾杰鲁米^[31]，回历 689 年（1290，元至元二十七年）死于泉州的哈只·本·艾欧伯克·本·哈只·玛利卡^[32]，以及回历 764 年（1363，元至正二十三年）死于泉州的哈只·和加·本·舍沙·玛尔达姆·易奇·乌鲁厄^[32]。

丁 即 din 或波斯语 eddin 的音译，意为宗教，大食蕃客的名字在末尾带有“丁”的不在少数。“绍兴元年（1131）有纳只卜·穆兹喜鲁丁者，自撒那威从商舶来泉，初兹寺于泉州之南城”^[34]。纳只卜·穆兹喜鲁丁为 Najib Mudhhirual - Din 的音译，“纳只卜”为人名，“穆兹喜鲁丁”为号，意为“宗教宣扬者”。“元至正间有回夏不鲁罕丁与里人金阿里修之”^[35]。夏不鲁罕丁即 Shaikh Burhan al - Din 的音译。失玛鲁丁，为波斯语 Shimal - eddin 的音译，意为“宗教首领”^[36]。

哈桑 为 Hassan 的音译，是什叶派穆斯林的惯用人名。唐昭宗“天祐元年（904）六月，授逼道三佛齐国人朝奉使都番长蒲河粟宁远将军”^[37]。“显德五年（958），其国（占城）王因德曼遣使者蒲河散来贡猛火油八十四瓶，蔷薇水十五瓶”^[38]。宋开宝五年（972），占城“遣使蒲河散来贡”^[39]。这里的“河粟”和“河散”均是 Hassan 的异译。此三人皆为“蒲”姓，是侨居东南亚的阿拉伯人。又如死于泉州（1371）的阿密尔·吐葛逊·阿密尔·阿里·本·哈桑·本·阿里·古鲁西^[40]。关于 Hassan 的音译，在元代至明代，逐渐接近“哈桑”。元代：如“马克护生三子：曰哈山……”^[41]；赛典赤瞻思丁“子五人：……次哈散”^[42]；倒刺沙，“西域人……仁宗时，以子

合散，事丞相拜住，得入宿卫。^[43]明代有“哈三”之名：“永乐十一年（1413）四月，太监郑和，奉敕往西域天方国，道出陕西，求所以通译国语，可佐信使者，得本寺掌教哈三焉”^[44]。

侯赛因 阿拉伯文读音为 Husayn，也是什叶派穆斯林惯用的人名。例如，回历 567 年（1171，南宋乾道七年）死于泉州的侯赛因·本·穆罕默德·哈拉提^[45]，还有侯赛因·本·哈只^[46]。

法蒂玛 即 Fatima，亦为什叶派穆斯林常用的人名。例如：回历 701 年（1301，元大德五年）死于泉州的法蒂玛·宾·奈纳·艾哈玛德^[47]，回历 729 年（1329，元天历二年）死于泉州的法蒂玛·哈通^[48]。

赛义德 为 Sayyid 的音译，又译作“赛典赤”或“赛夷”，意为“贵族”，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（先知）的后裔所特有的称号。例如：回历 702 年（1302，元大德六年）死于泉州的艾密尔·赛典赤·杜安沙，为中亚布哈拉（Bukhara）人^[49]。此人有“赛典赤”之称，为穆圣后裔，其先世可能移居布哈拉。

（三）以地名为人名

宋末元初人周密所著《癸辛杂识》云：“泉南有巨贾南蕃回回佛莲者，蒲氏之婿也”^[50]，“佛莲”即“Bahrein”的音译。Bahrein 为波斯湾附近一岛，又译巴林。

南宋岳珂《程史》云：“泉州有舶獠，曰尸罗围，货乙于蒲”^[51]。又南宋赵汝适《诸蕃志》卷上，“大食国”条云：“有番商曰施那帙，大食人也，侨寓泉南……”“尸罗围”与“施那帙”皆为 Shilavi 的音译，即指 Sirāf 地之人。“Sirāf 之名，因其当地之发音为 Shilov，故 Sirāf 之人，照例呼作 shilavi 矣。

尸罗围之发音，为最正确之 Shilavi 音也”^[52]。《重立清净寺碑》云：“宋绍兴元年（1131）有纳只卜·穆兹喜鲁丁者，自撒那威从商舶来泉，并葺兹寺于泉州之南城”。“撒那威”即 Shilavi 的音译，系指 Sirāf，即波斯湾之西拉夫港。西拉夫（尸罗夫）为公元 9~10 世纪波斯湾最繁荣的国际贸易港口。到 13 世纪后半期，此港开始衰落，霍尔木兹（Hormuz）取而代之。

《宋史》有记大食贡使“陀婆离”与“蒲陀婆离慈”^[53]，均系 Tabriz 的音译。Tabriz 即 Adharbâyjân 地方之 Tabriz 城。此即以地名为人名。从《宋史》的记载中，亦可知其为地名。其文曰：大食“其国部属各异名。故有勿巡，有陀婆离……然皆冠以大食”^[54]。以此为名者，还有元代来泉州的瞻思丁·穆罕默德·伊本·拉兹丁·塔布里兹^[55]。

侯赛因·本·穆罕默德·哈拉提^[56] “哈拉提”即 Khalat 的音译。Kharat 是中亚古亚美尼亚的首府（今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南部）。

曼苏尔·本·哈吉·葛斯姆·贾杰鲁米^[57] 贾杰鲁米即 Jajarm 的音译，Jajarm 是波斯北部塞姆省（Semnan）的一个城市。

哈只·本·艾欧克·本·哈只·玛利卡^[58] 玛利卡为 al-malaq 的音译。al-malaq 为土耳其斯坦（Turkestan）一个县的名称。

努冉萨·伊本·和加·巴拉德夏·伊本·和加·哈只·哈尔伯克花刺子密^[59] “花刺子密”为 Khorazmi 的音译，即花刺子模（Khorazm）人（1322 年死于泉州）。花刺子模国位于中亚，唐代译作“火寻”。公元 700 年前后为阿拉伯人征服，11~13 世纪由塞尔柱突厥统治，1218~1220 年被成吉思汗征服。